



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

北京出版社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 编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海外侨胞 与抗日战争

海外侨胞 与抗日战争

黄小坚 赵红英 丛月芬 著

北京出版社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编

内 容 提 要

本书记述了海外华侨、华人这一特殊群体在抗日战争中，从财力、物力、人力等各个方面对祖国的巨大无私的援助，以及他们与侨居地人民一道共同反击侵略所建立的历史功绩，十分生动感人。

作者在广泛吸取前人(包括港台以及海外华人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亲自查阅有关历史档案、海外社团的纪念刊等，充分利用第一手资料，在史料的挖掘上有新的突破；在目前数量不多的同类专著中，本书具有较为全面系统、客观翔实的优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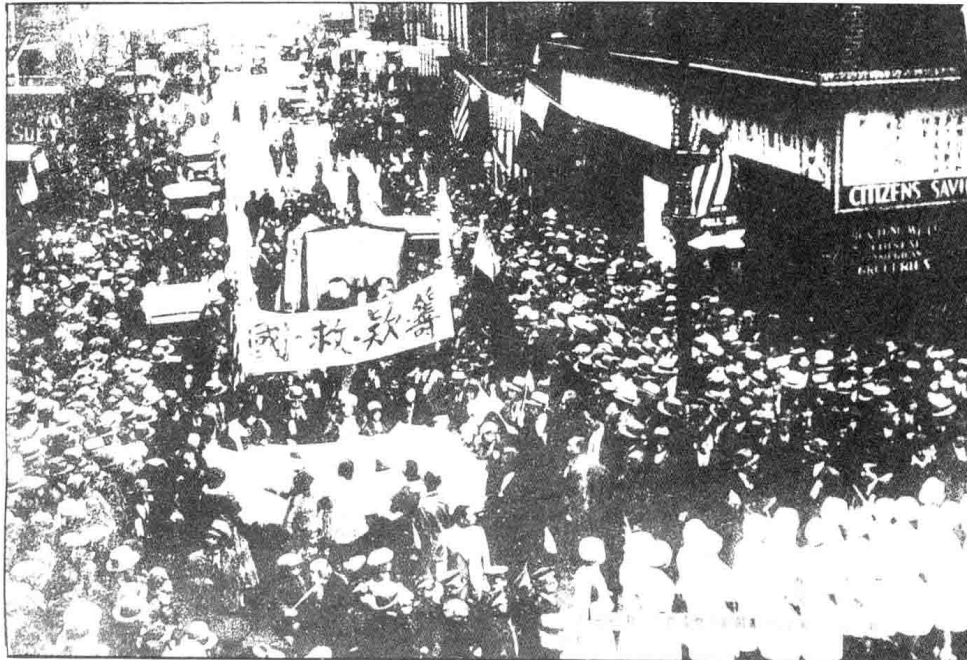
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任：刘大年

执行主任：白介夫

委 员：（按姓氏笔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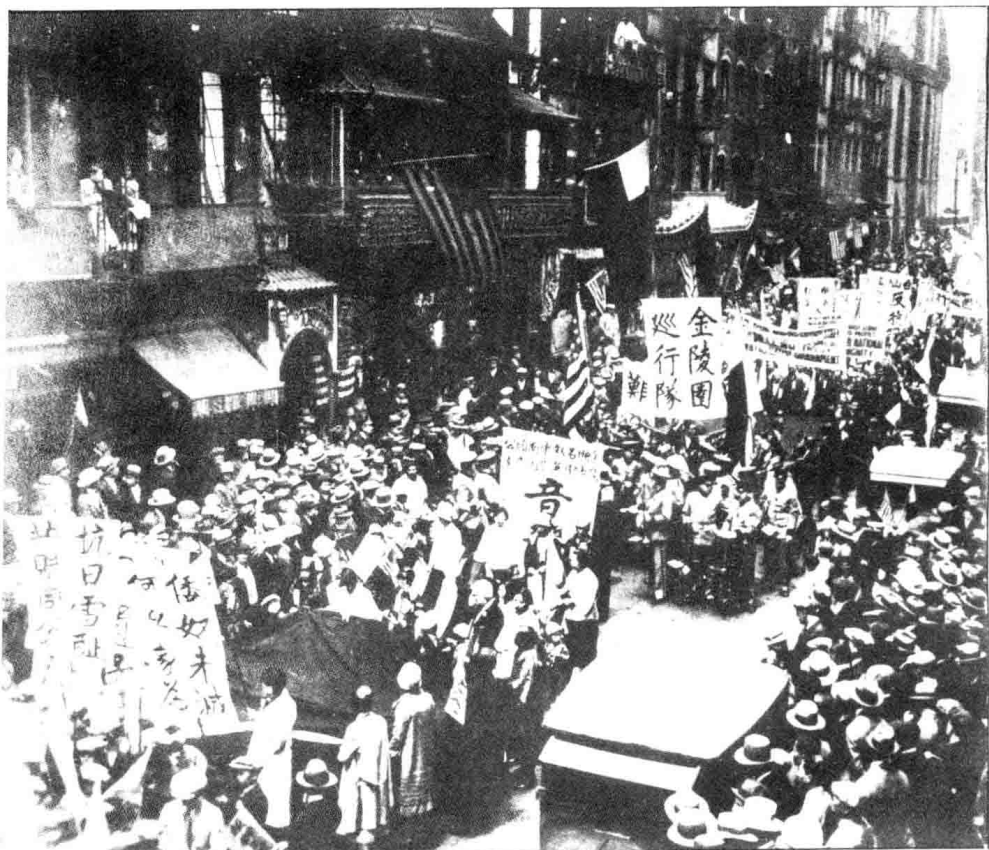
丁守和	马齐彬	王 淇
王庆成	王桢林	刘建业
齐世荣	齐密云	李 侃
李世凯	李良志	何 理
吴坤定	杨 策	肖一平
张注洪	张宪文	张海鹏
张承钧	金冲及	罗焕章
温贤美	戴 逸	



1932 年,纽约唐人街爱国侨胞劝募献金,支援在上海抗战的十九路军。

美国三藩市日人商店前的华人纠察队。





美国华侨抗日大游行。

南洋华侨学生卖花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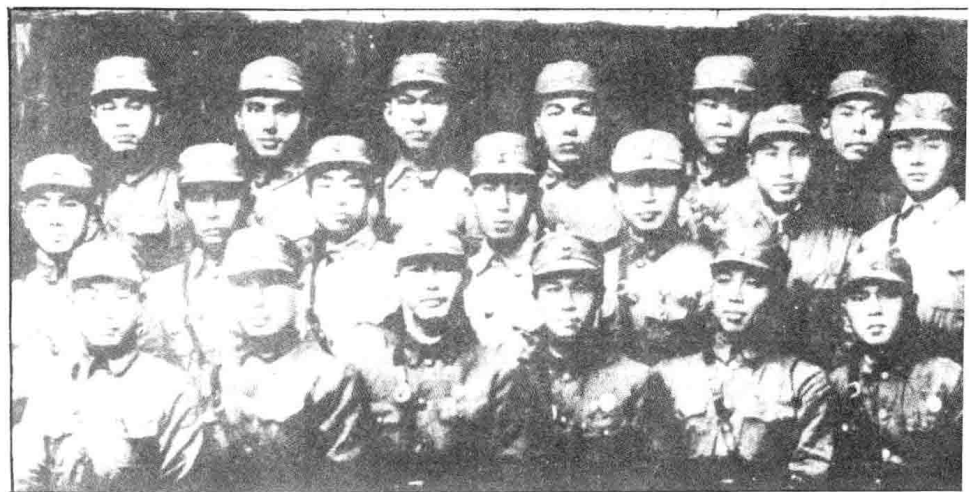


美洲华侨航空学校第一期学生合影



美洲华侨航空学校第一期学生。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十七期 26 总队第 8 队旅泰侨生毕业纪念。





1940年，华侨领袖陈嘉庚率南侨慰劳团抵渝时的欢迎场面。

在敵寇未退出國土以前
公務人員任何人妥和
牙條什者當以漢奸
國賊論
建新聞社
陳嘉庚

1938年10月，陈嘉庚向重庆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拍发的十字电报提案。

美国华裔青年入伍参
战。



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
支队队员在演习。



总序

刘大年

中国取得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一起，今年正逢 50 周年。50 年前的 1945 年，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值得隆重纪念。中国学术界出版了和正在出版一系列关于抗日战争史的著作，来纪念那个历史上的峥嵘岁月。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辑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是这些著作中的一部分。它的水平未必尽能让读者满意，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它是学术界为推动抗日战争研究，提高对这段历史的认识所作的一次努力。

人们认识历史有和旅行者观览名山大岳相像的地方。旅行者在山间辛苦跋涉，沿途奇峰陡壁，茂树丰泉，天险胜地，历历在目；但往往要走出山脚以后回头望去，方能见出它的逶迤势态，灵气所在。抗日战争结束 50 年以后的今天，人们回头来认识那段转换祖国命运的历史，显然要比以往的认识深刻许多，丰富许多。

中国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各阶级、各族人民团结起来进行的中华民族的解放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改变了

中国内部的阶级关系。抗日战争一是民族战争，二又是人民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前，国家权力基本上掌握在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各派系手里。有蒋介石、国民党的参加，才有了全民族的抗战。否则全民族的抗战就无从实现，一时实现了也无法坚持下去。抗战期间蒋介石没有放弃反共，也没有放弃抗战。从全民族战争这方面看，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应当得到客观的、全面的理解。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以中国的胜利而结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兴起是基本条件之一。这个基本条件的作用贯穿在抗战的全过程里。没有这个基本条件，全民族抗战就无从实现，蒋介石就只会在“攘外必先安内”的道路上走下去；或者全民族抗战一时实现了，能否坚持下去而不中途夭折，中国能否取得胜利，那是一个大问号。回顾一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历次对外战争的结局，就会充分明了这一点。从民族战争与人民战争相结合这方面看，人民力量兴起这个基本条件的极大重要性，更加应当得到客观的全面的理解。民族战争与人民战争有统一的一面，也有区别的一面。民族矛盾是起主导作用的、支配全局的矛盾。武装到牙齿的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情况一天存在，这个主要矛盾就要一天存在。

中国近代历史上有两个基本问题：第一，民族不独立；第二，社会未能工业化、近代化。它们一起把中国拖进了濒临灭亡的境地。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根本转折。这个根本转折，一是近百年间，中国抵抗外国侵略的战争无不遭受失败，抗日战争第一次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全面胜利；二是八年抗战决定性地改变了中国内部政治力量的对比。抗日战争中，军事上与国内政治关系上同时并存着两个过程，两种演变。一个过程、一种演变是日本的力量由强变弱，由军事胜利推进到最后彻底失败；又一个过程、一种演变，是国内两大政治势力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力量朝相反方向行走，人民力量迅速壮大起来。这两个过程、两种演变紧密相连。前一个

演变关系中国亡不亡国、民族能否独立的问题；后一个演变关系今后将是新中国还是旧中国、中国能否打开走向近代化前途的问题。谁在抗日战争中最出力，谁就在抗战以后更有力量，更有发言权，或者左右战后中国。抗战胜利准备了新中国与旧中国的决战。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人民解放战争很快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随之诞生，不久，中国并踏上了社会主义发展前进的道路。归根到底就是由抗日战争这个历史的转折，这个力量准备所造成的。新中国代替旧中国，第一，中华民族巍然独立了；第二，国家近代化的前途畅通了。中国于是开始了自己的复兴。用一句话来说：中国复兴枢纽——这就是抗日战争的八年，这就是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

中国历史上有多次大规模战争，中国近代有多次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抗日战争这样的规模、性质、结局的战争确实为洪荒所未有。是哪个力量决定中国抗日战争胜利，铸造出中国复兴枢纽的？那就是我们全民族的奋起，就是以共产党为中心的人民力量满负荷的发挥，砥柱中流。抗战八年的前四年，中国是单独对日作战的。其时苏美两大国都没有卷进到战争里面。英美与日本有矛盾，也有准备与日本妥协，牺牲中国的举动。苏联同情中国，但担心日本北进，苏德战前，苏联与日本订有为期五年的苏日中立条约。与日本全力抗衡的，这时举世唯有中国。1941年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与英美结成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中国由此不再单独对日作战，而是与同盟国一起对日作战了。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结局，于是就变成了在盟国支持、协同下，共同对日胜利的结局。这是国际形势的大框架、总格局规定的。不但中国抗战的面貌焕然一新，世界的面貌也一下子刷新了。然而这并非中国抗战取胜的特点，而是反法西斯各国取胜的共同点。世界反法西斯斗争是一个整体，最后一败俱败，一胜俱胜。同盟国间的支持是相互的，双向的，

而非某种单行道。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主要战场之一。有中国这个主要战场,才有东方反法西斯的胜利。中国抗击的日本兵力最多。按日军师团编制计算,“七七”事变到1945年,日本历年投入到中国关内战场上的陆军,最多的年份占编制总额90%,最少的一年占35%,八年中平均每年占76.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陆军主力仍分布在中国战场上。中国摧毁的日军有生力量数目最大。“九·一八”至“八·一五”期间,日军出国作战共伤病战死287.4万人。其中89万余人死于太平洋战争,多达198.4万人是死在中国战场上的。中国为战胜日本法西斯死亡2000余万人,付出了最高昂的代价。整个二次大战中,英国武装部队、本土加殖民地人民共死亡80万几千人,美国海陆空军死亡共32万余人,其中仅一部分是牺牲于对日作战的。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其武装力量、边防军和内卫部队共牺牲866.84万人,死于对日作战的也只有3万余人。中国抗日连续八年,前期苏联援华物资约1.7亿美元,后期美国援外物资共460亿美元,援助中国的不过6.3亿美元,不足七分之一。中国是靠自己的力量抗日作战到底的。国际形势的大框架、总格局,使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结局来自与同盟国共同对日作战,这丝毫没有改变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胜利的地位。苏联红军是打败希特勒德国的决定性力量,仍然需要有美英联军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美军是太平洋上打败日本的决定性力量,一直攻占了日本冲绳岛,仍需有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粉碎那里的日本关东军。谁也不能因此认为苏联英美并非单独对德对日作战取胜的,其历史重要性就减少了,地位就改变了。中国在打败日本的作战中的地位,正像欧洲战场上的苏联,太平洋战场上的美国那样。抗战期间流行一句话:兵民乃胜利之本。也可以说,中华民族空前觉醒,中国人民力量兴起壮大,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之本。中国由衰败向复兴转换,就是靠的这个本。

自从新中国迈上征途的第一天起，中国复兴的鸿篇巨制联绵不绝于书，尽管其间也有挫折和失败。现在，抗日战争过去了50年，中国人民正旅行在一座新的大山上。这座大山高耸霄汉，它不叫别的什么，叫做中国的现代化。和一切历史性的旅程一样，人们在当前这个旅程中，不可能一路尽是春日载阳，百花齐放，群莺纷飞，也难以避免要经历悬崖栈道、崎岖羊肠，或者碰上寒冬腊月，大雪狂舞。增进对抗战中体现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爱国精神传统的认识，增进对中国人民敢于反抗强敌、顶天立地气概的认识，也必将增进人们对现代化旅程胜利前途和应当如何有所作为的认识。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华民族的光荣，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历史总会这样那样作用于现实，无论现在、将来，我们有充分理由珍惜这个光荣，发扬这个光荣。

就像历史本身永无穷期一样，人们认识历史至少一些方面也无穷期，以至终究要遗留下难以弥补的缺陷。这只会促使有志者去勇于探索、发现真理，而不会裹足不前。不管怎么说，今天我们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毕竟有所前进了，那场伟大的战争改变了中国，也参与改变了世界。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谨请以这部《丛书》献给所有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人、爱国者、战士和所有先烈。

1995年2月11日

序 言

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会长 张楚琨

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已有半个世纪了。当时二十多岁的我，亲身经历过八年抗战和太平洋战争，而今已届耄耋之年了。广大华侨与国内外人民一道共同反击侵略者的英勇奋斗的感人业绩，仿如昨日，不断在我脑海里浮现。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我在新加坡担任《南洋商报》记者（副刊《狮声》主编兼评论员），面对那波澜壮阔的华侨抗日救亡运动，心情十分激动。新加坡各界华侨在以陈嘉庚先生为主席的“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简称为“新加坡筹赈会”）的领导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输财助饷，支援抗战。群众战斗组织主要有两个：一是马来亚共产党建立的“马华抗敌后援会”，另一个是我参与组织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新加坡队（简称“新加坡民先队”），靠拢中国共产党。

1938年10月10日，陈嘉庚先生发起成立

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南侨总会为南洋 800 万华侨抗日救亡的最高领导机构，当时东南亚各地的分支机构多达 700 余个，形成广泛的华侨抗日群众运动，取得辉煌的成就。最大的贡献当然是募集巨款援助祖国抗战。陈嘉庚先生在《南侨回忆录》中曾说，抗战期间南洋华侨每月捐输可达 1000 万元，如果将义捐存银行作纸币基金，在国内可发行四倍的纸币，即达 4000 万元。而当时中国抗日正规军 300 个师约 300 万人，每月食饷约为 4650 万元。换言之，南洋华侨的捐资，几乎可以养活 300 万抗日将士。这当然是了不起的贡献了。至于寄返祖国的侨汇，则数量更多，作用更大。派遣机工回国服务是华侨支援抗战的另一大事。当时沿海口岸相继沦陷，只有安南和滇缅公路还能通行，由于缺乏司机和修理技工，陈嘉庚先生应国内的急电请求，于 1939 年组织 3000 余名华侨机工在滇缅公路抢运军需物资。因为山高路险和敌机的轰炸扫射，约有 1000 多司机为抗战献出了生命。1939 年 9 月，我曾会同陈嘉庚先生的代表刘牡丹深入云南，了解机工回国参加抗战的情况，后来还与同行记者陈戈丁合著《滇缅公路考察记》一书。当年机工的爱国热情和无私奉献，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

陈嘉庚先生还组织和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回国慰问抗战前线与后方的军民，我是慰劳团的成员。

海外的华侨不仅系祖国的存亡兴衰，而且还与当地人民荣辱与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大举南进，南洋一带的华侨即与当地人民携起手来，共同抗击日寇。菲律宾有“华支”；缅甸有华侨战时工作队。新加坡的抗敌活动和“星华抗日义勇军”十分突出。我记得，日本帝国主义打到马来亚，新加坡文化界同人首先成立新加坡文化界抗敌动员会，主席为著名作家郁达夫，副主席为著名新闻权威胡愈之，我担任秘书长。同时又成立“星洲华

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团长郁达夫，副团长胡愈之，宣传部长和训练部长分别是王任叔和庄奎章，组织部长由我担任。新加坡人民斗志昂扬，要求武装保卫新加坡。英殖民当局没有坚守决心，但又不得不请求陈嘉庚先生担任“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主席。马来半岛正面抗击日军前后约两个月，尽管后来新加坡等地还是落入敌手，但该总会建成的“星华抗日义勇军”（后来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和“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的战斗，充分说明华侨把侨居地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他们与当地各族人民同呼吸、共患难。

海外的华侨、华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既爱自己的祖籍国，又爱自己的居住国。这些特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在世界人民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即将来临之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学会和北京出版社等，筹集巨资，编撰出版多卷本的丛书，展现英勇悲壮的历史画卷，其中还单辟一卷，将华侨的光辉业绩载入史册。这对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加强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凝聚力和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都是大有裨益的。

编撰《海外侨胞与抗日战争》的三名同志均为年轻的史学工作者，其中两位我比较熟悉。黄小坚同志 1983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曾在中共福建省直属机关委员会工作和福州大学任教有年，后回北大深造并获历史学硕士学位，数年前到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供职。承担主编此书的任务后（1993 年下半年），他广泛研究、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并曾两次到座落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有关的历史档案，不仅使全书体系更趋完整，表述内容较为客观，而且也在史料的挖掘上有了新的突破。赵红英同志也是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她先在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从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杂志的编辑工作，后因工作需要调